



百年党史“六有六无”

胡捷 方华 杜柯柯



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对于这种由内而外喷薄而出的自信,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辩证看待的。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拥有强烈的自信心,坚信自己所推动的中国社会变革不是国外发展道路的再版、翻版,而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创新”,不仅能为中国人民,也能为世界人民解决难题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深知“谦受益、满招损”的至臻道理,始终保持谦逊谨慎、戒骄戒躁的基本态度,始终以平等的姿态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交往,吸收人类历史长河中一切有益经验,借鉴外国政治文明中一切有益成果,愿意在独立自主、平等公正的基础上与各国、各政党普遍交往,携手前行。中国既不走一强就霸的老路,也绝不接受别国教师爷般的颐指气使,而是在自信平和的心态中,在蹄疾步稳的追梦征途上,不懈前行,永不止步。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所以能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辛又出发,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在其一世纪的苦难辉煌中能努力做到并始终坚守“六有六无”。

一是有公益而无私利。“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无产阶级政党除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之外,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定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是因为毫无私利,中国共产党因而敢于刀刃向内,以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决心与勇气,推动实现彻底的自我革命;正是因为毫无私利,中国共产党因而能跳出旧式党派发展自私封闭的小圈子,从5000年古老中国进化重生的角度推动实现彻底的社会革命;正是因为毫无私利,中国共产党因而能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胸襟,集众智,用众力,彻底结束旧中国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局面;也正是因为毫无私利,历史和人民最终选择了由中国共产党承担民族复兴的无上光荣、无比艰巨的历史重任。

二是有挫折而无丧气。革命理想越是美好远大,实现理想的过程就越是艰辛曲折。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既有过凯歌猛进的光辉

岁月,也经受过如暴风雨的侵袭摧残。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至少遭受过三次大的挫折。第一次是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叛变革命,导致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第二次是1934年,中央领导者“左”倾冒险,指挥失措,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退出中央所在地,被迫长征;第三次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急躁冒进,曲折前行,连续犯下“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毛泽东同志说:“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我们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无论是面对穷凶极恶的内外敌人,或是遭遇百年难遇的自然灾害,中国共产党人从没有丧失信心、丢失斗志,始终心中有火,眼中有光。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不断尝试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科学的方法,在不断总结中摸索走出困境的正确的道路,在不断斗争中增长革命、建设的本领,在不懈进取中夺取最终的胜利。每一次遭受挫折、陷入低谷之后,继而到来的必是一场大转折、大觉醒、大奋起。敢于否定自己,愈挫愈勇是中国共产党难能可贵且特色鲜明的精神品质。

三是有奋斗而无止境。1949年,在即将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进京赶考”的论断。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抱有备考、赶考、临考、应考的情绪与心理,如履薄冰,如负重担;始终抱有“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与境界,兢兢业业,奋斗不止;始终抱有不学无术,不当李自成,干不好就要被开除球籍的自觉与清醒,自查自警,自省自励。中国共产党深深认识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从来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中国共产党从不在已有的成绩面前放慢前行的脚步,而是把过往的成绩当作是新奋斗的起点与激励自己战胜困难的底气,勇敢投身于下一场奋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中国共产党的赶考之旅又踏上了新征程。

四是有坚守而无保守。“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对于自己所信仰的理论、行走的道路、建立的制度、推崇的文化,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抱有一种既坚定不移,又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之初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不畏风雨险阻,始终高擎不变。另一方面,中国共

产党秉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务实态度,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走中国化时代化的道路,创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道路、文化。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在于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的能以务实、开放、不保守的态度学习马克思主义,践行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使诞生于170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绽放出时代的光芒,使蕴藏于马克思主义当中真理、道义的力量在中国大地上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百年历程,光阴为证,马克思主义没有辜负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更没有辜负马克思主义。

五是有爱护而无袒护。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只有50多名党员,是当时中国政坛最小的政治力量之一。今时今日,中国共产党拥有9600多万名党员,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无论是初始阶段,还是逐步做大做强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的党员从来都是知之深、爱之重、责之切。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曾提出共产党员的五条标准:一是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二是忠实;三是

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四是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五是不吃鸦片、不赌博。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指出合格党员应具备“五种精神”: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和压倒一切困难精神、革命乐观主义和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精神。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全党同志要加强党性锻炼,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习近平总书记是把对党员同志的爱体现在对党员的政治生命负责上,体现在用党内法规纪律保护党员民主权力上,体现在对困难党员悉心帮助上,更体现在猛药去疴、重典治乱,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上。有原则且坚持原则的爱,是党组织对党员最大最真诚的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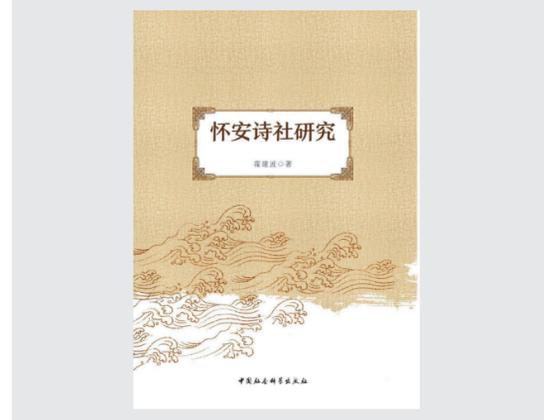
六是有自信而无自大。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创造了四个伟大成就,实现了四次伟大飞跃,具有五个方面重大历史意义,积累了“十个坚持”的历史经验,将优异的成绩写在了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写在了14亿多群众的心坎里,写在了5000年中华民族发展的史册中。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对于这种由内而外喷薄而出

的自信,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辩证看待的。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拥有强烈的自信心,坚信自己所推动的中国社会变革不是国外发展道路的再版、翻版,而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创新”,不仅能为中国人民,也能为世界人民解决难题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深知“谦受益、满招损”的至臻道理,始终保持谦逊谨慎、戒骄戒躁的基本态度,始终以平等的姿态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交往,吸收人类历史长河中一切有益经验,借鉴外国政治文明中一切有益成果,愿意在独立自主、平等公正的基础上与各国、各政党普遍交往,携手前行。中国既不走一强就霸的老路,也绝不接受别国教师爷般的颐指气使,而是在自信平和的心态中,在蹄疾步稳的追梦征途上,不懈前行,永不止步。

有公益而无私利,讲的是“本”;有挫折而无放弃,讲的是“气”;有奋斗而无止境,讲的是“势”;有坚持而无保守,讲的是“道”;有爱护而无袒护,讲的是“与内”;有自信而无自大,讲的是“与外”。正是因为处理好了“本”“气”“势”“道”“内”“外”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国共产党才能获得昨日的辉煌,进而夺取明天的胜利。

(作者胡捷系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方华系国防科技大学副教授,杜柯柯系国防科技大学讲师)

《怀安诗社研究》



内容简介

怀安诗社成立于1941年的延安,在以大众化与新诗为主流的延安文坛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怀安诗社研究》从古典诗学视角出发,对延安时期创作旧体诗词的怀安诗社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和研究,是学界第一部研究怀安诗社的学术专著。该书在界定怀安诗社概念的基础上,对怀安诗社的研究现状、社会背景与文化语境、成员组成与活动历程、诗论主张与创作实绩、地位影响与得失成败等问题均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析,重点讨论了李木庵、谢觉哉两位怀安诗人的创作成就以及游南泥湾诗、延安颂诗与红云曲等三类怀安诗名篇。可以说,该书是霍建波教授将古典诗学与红色文艺相结合所作的跨学科研究实践与学术探索,也是怀安诗社成立80周年以来的重大学术收获,同时对丰富和开拓延安文艺以及延安精神研究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作者简介

霍建波,1973年生,文学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学术领域为中国古典文学为依托的先秦诸子研究、隐逸文化研究和怀安诗社研究。2002年博士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师从霍松林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多项,出版《宋前隐逸诗研究》《隐逸精神和传统文化》《先秦诸子思想精华与文学价值研究》等学术专著多部,研究文章见刊于《内蒙古社会科学》《兰州大学学报》《河北学刊》《甘肃社会科学》《求索》等重点学术期刊。现为延安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古代文学硕士点导师组组长,延安社科专家库专家,延安圣地英才。

烽火中的诗社——《怀安诗社研究》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时期(1935年10月—1948年3月)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延安文艺(1935年10月—1949年7月)的形成与演进是中国文学史上重大的历史文化事件,它直接影响甚至规范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怀安诗社(1941年9月—1949年9月)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史上第一个以创作旧体诗为主的文学组织,该社1941年9月5日成立于延安,历时八年,主要运用旧形式表现新内容,堪称延安文艺史上的独特存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怀安诗人们唱赠答、言志抒怀、鼓舞革命情绪,对延安文艺乃至中国革命均作出了较为独特的历史性贡献。

在社会时代与文化思潮发生剧烈变革之际,一种有着自身稳固特质与悠久历史传统的文学体裁,如何适应社会时代的发展,跟上时代思潮的节奏,与时代生活接轨,正是旧体诗从新文化运动以来直至延安时期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在经历了重重磨难之后,经过自身的努力蜕变,旧体诗终于成功闯出了困境,为自己在延安文艺的诗坛上赢得了一席之地,并随之展示出了不俗的创作成绩。在延安文艺时期,毛泽东、萧军、吕振羽、鲁克、魏传统等都创作过数量不等的旧体诗词,但笔者认为此期创作旧体诗的重镇在怀安诗社,其标志性成果便是怀安诗。

怀安诗是怀安诗社的成员所创作的诗歌作品,故要界定怀安诗这一诗歌范畴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就必须从怀安诗社的成立开始说起。1941年9月5日,怀安诗社成立于陕西延安。当时的延安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和圣地,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这里领导和指挥抗日战争以及中国的革命战争,它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的爱国青年、进步人士等。对于怀安诗社的成立过程以及诗社宗旨等基本情况,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有较为详细的报道。该报1941年9月7日第2版“本市讯”称:

九月五日,林伯渠、谢觉哉、高自立等同志,于交际处宴请延安民间诗人墨客,到会者多为寿高六十或七十岁以上之老人,如东市遗老吴汉章老先生、席老先生、白老先生等十余人,并请王明同志作陪。其中计有秀才五人,拔贡一人。畅谈当年入场及清末遗事甚欢。因当场多诗词之士,乃由林老发起组织一诗社,本“老者安之,少者怀之”之旨,定名怀安诗社,由法院李木庵同志主持诗坛,汇集佳作。闻者多称之日延水雅集。

怀安诗社之名来源于上文所提及的“老者安之,少者怀之”,这是《论语·公冶长》篇中孔子的话语,也是孔子作为儒家代表人物所表达的一种政治理想。孔子确切的原话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意思是说,“老人得安,朋友得到信任,年轻人得到关怀”。这段话不仅充分体现出孔子宣扬的“仁政”思想,同时也很富有人情味。对于“怀安”二字,林伯渠解释为:“边区建设民主政治,要做到老者能安,少者能怀,深寓策励之义。”1941年10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诗社成员谢觉哉(署名焕南)的《从怀安诗社谈起》一文。该文把“怀安”理解为“敬老慈幼”,认为“老安少怀,是社会的事业”,老人“应该得到社会上的尊重”“小孩是未来社会的主人,小孩养得好,有健壮的体力,教得好,有实际的能力,这就是未来社会比现在社会要好些的保证。所以保育小孩是上一代人的神圣义务”。由此可见,当时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之所以倡议成立怀安诗社,是很有深意的。它不仅是为了创作诗歌、言志抒怀,同时还体现出怀安诗人的人文精神与政治担当、政治关怀。

1941年9月15日,重庆《新华日报》第1版——“本报七日延安电”以“延安老人组诗社成立怀安诗社”为题,对怀安诗社的成立也作了具体报道。除了个别地方,该报道的主要内容与《解放日报》基本一致。该报称:

九月五日,林伯渠、谢觉哉、高自立等同志宴请延安民间老人。到会者为寿高六十至七十以上老人,如吴玉章老先生、席老先生、白老先生等十余人,并请王明同志作陪,且有虞清秀才五人、拔贡一人,畅谈当年入场及清廷遗事甚欢,当场诗词之士乃由林老发起组织一诗社,本“老者安之,少者怀之”之旨,定名“怀安诗社”。少法院李木庵同志主持诗坛汇集佳作,闻者多称为延安雅集。

如果说《解放日报》的读者群主要集中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那么作为社址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其读者群则主要集中在国统区,尤其是以在重庆的工人阶级为主体。故《新华日报》对怀安诗社成立所作的报道,可以说是《解放日报》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宣传了怀安诗社,把怀安诗社从革命根据地推介到了国统区,大大扩展了其知名度与影响力。稍后(即1941年9月28日),身在重庆进行革命工作的董必武便作诗四首——《闻延安成立“怀安诗社”,赋四绝句兼呈吴徐谢林诸老、朱总司令、叶参谋长》寄到延安参与诗社酬唱,便是怀安诗社在国统区产生影响的明证。

怀安诗社成立以后,《解放日报》曾开辟“怀安诗选”专栏刊登怀安诗人的旧体诗词作品。如1941年10月16日,《解放日报》第4版的《怀安诗选》栏目就发表了林伯渠、谢觉哉、朱斐、李木庵等的9首诗词作品;1942年2月21日,《解放日报》第4版《怀安诗选》专栏又发表了续范亭、林伯渠、张曙时、李木庵、李健侯等的12首诗词。据统计,《解放日报》共刊发旧体诗词作品(包括非怀安诗在内)100多首。《解放日报》对宣传怀安诗社,传播以怀安诗为主体的旧体诗词作品,扩大怀安诗社的社会影响力等均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来,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一般是不刊发旧体诗词的。之所以能够开辟专栏发表怀安诗人的旧体诗词作品,据说是

得到了毛主席的批准。如王敬等所说,《解放日报》副刊一般不发表旧体诗,其他版面也只是在重大纪念日或特殊情况下才发表领导人或党外著名人士的旧体诗。这是请示过毛主席的。毛主席说旧体诗不好懂,容易束缚思想,不提倡写旧体诗,但有些老人不会写新诗,只会写旧诗,发表一些也是可以的。可以说,怀安诗是《解放日报》副刊上最早刊发的旧体诗词作品。同时,这种做法也是得到了当时党政军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同志许可的。故怀安诗在其艺术精神的本质上与当时的革命斗争形势是一致的、不相违背的,某些人认为旧体诗创作与延安文艺的主流思潮矛盾的说法是错误的,或者说是不确切的。

综上所述,怀安诗社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史上第一个古典诗歌的诗社”“怀安诗社的诗篇是延安时期文艺领域的一枝奇葩……它虽然是短小的抒情诗形式,但并不妨碍它描绘整个民族、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天翻地覆的斗争”。怀安诗社与在江苏北部阜宁县文化村成立的淮海诗社(1942年11月,又名淮海文艺社)、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立的燕赵诗社(1943年2月)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下的文艺社团,它们呈三足鼎立之势。三个诗社遥相呼应,为中国抗战文艺的发展作出了特殊的历史性贡献。三个诗社虽然都以创作旧体诗为主,但是比较而言,不管在运作时间、成员组成、诗论主张、诗作数量以及作品的影响力上,淮海诗社和燕赵诗社均无法与怀安诗社相比。因此相对而言,怀安诗社更具有代表性,在当时与以后的影响也更大。诚如王敬所说,怀安诗社“是我党以诗会友,通过文艺创作活动团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爱国民主力量的成功尝试”。怀安诗社“不仅团结了广大爱国进步的仁人志士,而且繁荣了延安的诗坛”。总之,笔者以为,比起淮海诗社与燕赵诗社,怀安诗社更值得引起读者和研究者的关注。



本栏目由延安书局协办